



ICSL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CSLA, Vol. 2, No. 1, 2026, pp.165-172.

Print ISSN: 3079-2711; Online ISSN: 3104-5081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icsla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icsla260117rircl>



比较文学与区域研究的融合新生

——评《比较文学与区域研究：危机、整合与挑战》

王劭康 (Wang Shaokang)

摘要：比较文学学科自十九世纪以来屡经挑战。当今社会的技术进步、政治经济变迁及文学媒介扩展使得比较文学面临复杂的新形势。在此背景下，关于研究范式、学科定位及权力结构的反思和批判不断涌现，使比较文学面临危机。但这一危机也推动了学科的不断发展。新近出版的《比较文学与区域研究：危机、整合与挑战》一书聚焦于这一状况，借助加亚特里·斯皮瓦克的后殖民理论，探讨如何解决比较文学的危机，并推动其与区域研究的融合，为“新比较文学”的未来展望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可能性。

关键词：比较文学危机；区域研究；斯皮瓦克；学科转型

作者简介：王劭康，北京师范大学文理学院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类型文学与比较文学理论，电邮：wsklaureate@foxmail.com。

Title: The Reinvigoration Through Integration: A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Area Studies: Crises, Challenges, and Integration*

Abstract: Since the 1900s the disciplin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as undergone numerous challenges. Today,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shift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expansion of literary media have plac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 complex new landscape. Against this backdrop, continuous reflections and critiques regarding research paradigms, disciplinary positioning, and power structures have precipitated a sense of crisis within the field. However, this crisis has also served as a catalyst for the discipline's evolution. The recently published book,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Area Studies: Crises, Challenges, and Integ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focuses on this predicament. Drawing on Gayatri Spivak's postcolonial theory, it explores strategies to address the crisi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promote its integration with Area Studies, thereby offering new perspectives and possibilities for envisioning the future of "New Comparative Literature."

Keyword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risis; Area Studies; Gayatri Spivak; disciplinary transformation

Author Biography: Wang Shaokang, Ph.D. candidate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British and American genr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E-mail: wsklaureate@foxmail.com.

自十九世纪“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逐渐成形以来，这一学科的发展已历经二百余年的历史，当今比较文学学科所面对的世界已经与比较文学诞生时所面对的世界大相径庭。技术文明的发展、政治经济局势的巨变、文学媒介的扩张……当下比较文学面临着复杂多样的新形势。“文学在当今媒介不断迭新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形态和功能的巨大变化，镶嵌在网络文化、视觉文化、游戏文化之中，所以对文学的研究不得不涉及更加宽广、全面的文化领域。”¹这一背景下，对于研究范式、学科定位、研究对象、权力结构等一系列问题的反思与批判层出不穷，比较文学学科持续陷入危机之中，并在危机中不断发展。近日出版的《比较文学与区域研究：危机、整合与挑战》一书就着眼于这一状况，以比较文学百年危机史为主要线索，以加亚特里·斯皮瓦克的学科愿景与后殖民理论为基础，对探索一条有助于解决比较文学学科危机，并推动比较文学研究在革新中服务于人类未来共同体的道路作出了有价值的尝试。本书在关注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历史性脉络的基础上，探讨了比较文学与区域研究学科融合的意义与可能性，并对“新比较文学”的未来愿景进行了分析与展望。

一、“四度危机”中的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

“比较文学虽然屡遭危机，但正是由于‘危机’已成为一个常识性的、基础性的学科理论，所以它反向建构了比较文学的话语体系，我们可以称之为解构式建构。”²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过程，也正蕴含在其“危机史”之中。在本书的论证中，作者首先以“比较文学的‘危机史’”开篇，用四个危机阶段的划分，梳理了自十九世纪以来“比较文学”学科所受到的屡次质疑与动摇，以“危机史”的概念串联起比较文学学科史的独特脉络。

以对方法论的反思为共同特征，李国栋将二十世纪初克罗齐高举“历史—美学综合”的旗帜对“比较文学”之“比较”概念的质疑与五六十年代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为代表的“危机论”对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反省、艾田伯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对法国学派/美国学派方法论之争的斡旋作为比较文学学科危机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原本是最广为人知的比较文学学科危机时期，但尽管有历史阶段的差异和具体观点的不同，克罗齐、韦勒克和艾田伯实际上关注的是同样的美学方法论问题，这一问题集中体现在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实证与审美之争，因此作者将其归于“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危机”的不同部分，三者的批判共同构成了比较文学第一度危机。

¹ 李国栋（2024）：《比较文学与区域研究：危机、挑战与整合》。重庆大学出版社：16。

² 李国栋（2024）：《比较文学与区域研究：危机、挑战与整合》。重庆大学出版社：58。

比较文学的第二度危机则是英国“文化翻译学派”领军人物苏珊·巴斯奈特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比较文学批评导论》中所指出的“比较文学之死”¹。巴斯奈特指出了新生代研究者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放弃，对将文学与审美圣化、纯化观点的狭隘性，以及文学性脱离历史文化语境导致的欧中中心主义等问题。在后殖民主义的影响下，她认为欧洲“教化世界”的研究取向是对比较文学的毒害，这也导致了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旧比较文学”的死亡。巴斯奈特将“新比较文学”的出路投注于翻译研究，但这一对于“翻译转向”的号召却出现了失灵——巴斯奈特本人也在后期承认了这一失察，否定了“比较文学之死”的说法。对于巴斯奈特在学科发展方向上的失察，作者指出，其问题在于忽视了比较文学学科的自我更新，李国栋指出，“比较文学”是一个宏观学科，而巴斯奈特恰恰将属于某一阶段和学派的狭义比较文学当作整体死亡的象征，“虽然已强调了比较文学不能被定义，但在急于宣扬、抬高翻译研究的地位时，仍然陷入了一个预先定义的思维陷阱。”²

在巴斯奈特之后，又一次对比较文学整体学科进行质疑的是解构主义耶鲁批评派的代表性学者J·希利斯·米勒。米勒2003年发表的《比较文学的（语言）危机》中同时对韦勒克的危机论与巴斯奈特的翻译研究进行了攻讦。米勒认为韦勒克开启了比较文学不着边际的宏大叙事，又使得比较文学固守“文学性”，“只允许文学和文学理论发挥神圣的审美救赎功能”³。不同于韦勒克，他认为比较文学遭遇的不是某一次“危机”，而是永久在遭遇“危机”。而这种“永久危机”恰恰就体现在比较文学翻译的语言问题上——比较文学研究者几乎没有人拥有自己研究文本的母语能力，而以英语为代表的中介语言蕴含着“强势语言的文化帝国主义”⁴，翻译过程中的文本选择、文义和文化内涵的微妙损耗都是不可解决的。因此，语言问题带来了无可避免的西方中心论，而比较文学学科自韦勒克以来所谓“回归世界文学”的解决方案，也不过是将世界翻译成英美、又进一步把英美霸权向全世界扩张罢了。另一方面，米勒著名的“文学终结论”又认为作为传统媒介的纸质印刷文学已经走向终结，而且替代品的电子文本也将在未来被视听媒介所取代。作为文学一部分的比较文学自然也难免。因此，比较文学的第三度危机是语言与媒介的双重危机。作者在此指出，米勒所描绘的危机图景尽管严峻，但并非没有解决之策。一方面，米勒承认文学的“可译性”，语言危机可以通过对其他语言的尽量学习以及对跨文化研究的强调得到尽可能的解决，中国“比较文学变异学”中的跨语际变异研究、文化过滤研究就是针对此种危机而出现；另一方面，对所谓“文学终结论”，也可以通过拓展跨媒介文本、重审历史文本等方式，实现学科自我迭代，在危机中谋求新的发展。

在前三度危机的基础上，作者将后殖民主义代表人物，著名比较文学学者加亚特里·斯皮瓦克的《一门学科之死》所描绘的景象作为整个比较文学学科最后一度、也是终结整个危机史的危机。李国栋从斯皮瓦克“学科”（discipline）的词源出发，认为斯皮瓦克将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性质与福柯意义上的“规训”（discipline）是接近的：“对‘比较文学’的定义首先就是对这一研究领域的控制，包括对研究目的、对象、方法、假设、结论、目的的限制，这一限制的背后是主体对他者的镜像投射。知识无法摆脱主观性的预设，也就在一系列语言先见、思想先见中展开。”⁵

¹ [英]苏珊·巴斯奈特著（2015）：《比较文学批评导论》，查明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54。

² 李国栋（2024）：《比较文学与区域研究：危机、挑战与整合》。重庆大学出版社：6。

³ [美]希利斯·米勒著（2016）：《萌在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国荣译。南京大学出版社：142。

⁴ [美]希利斯·米勒著（2016）：《萌在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国荣译。南京大学出版社：142。

⁵ 李国栋（2024）：《比较文学与区域研究：危机、挑战与整合》。重庆大学出版社：79。

斯皮瓦克对于旧比较文学政治化、欧洲中心主义和全球化的弊病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她认为旧比较文学机械地、二元地按照一套他者化范式来构建文学的世界版图，从而使比较文学失去了有机体的活性，导致了“比较文学之死”；作者回到文学史中比较文学的学科定位，认为斯皮瓦克描述中的比较文学作为学科而言，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规训下“活着”的拟人化有机体，只有其“死亡”才能带来去学科化的思维解放、知识解放；而继续延续这种死亡的比较文学，无异于驱使一个脑死亡的巨人如行尸走肉般活动，是毫无意义的。因此斯皮瓦克表示，“我希望这本书将被当作一门濒死学科的最后一口气来阅读。”¹斯皮瓦克第四度危机中的“死亡”不同于巴斯奈特，这一“死亡”更多的是对于学科重建的愿景，也即她所提出的“新比较文学”²。在这种“新比较文学”中，比较文学与区域研究的学科融合成为了解决比较文学“永恒危机”的破局之策。

二、比较文学与区域研究的困境及整合

在比较文学的“四度危机”之后，斯皮瓦克着眼于“比较文学”与“区域研究”两门学科的邻近性与共同面对的困境，认为“区域研究”与“比较文学”的融合是一个契机，意味着有机会跳出西方意识形态内部，着眼于对应区域的语言特质和文化异质性，让两门学科在更广阔的领域复兴，成为一种“新比较文学”。以这一观点为起点，作者将斯皮瓦克对于比较文学和区域研究的整合视作一种对白人男权中心主义的西方中心话语的解构与再建构。是将富含“政治上的好斗秉性”的男性气质学科“盖娅化”的尝试。作者并不把比较文学与区域研究的融合判定为一个学科对另一个学科的吞并与占有，而是在两者相近的历史发展问题中寻求共同的解决之策，并试图达成比较文学与区域研究的学科互补。比较文学学科长期以来的西方中心主义问题，在几个世代学者的批评声中几乎已经被说倦；而区域研究同样是一门充斥着令后殖民主义学者与区域民族国家难以忍受的“殖民凝物”景象的学科：现代区域研究可以划分为冷战意识形态下的“反共范式”和世界主义理想下的“覆盖范式”，前者充斥的意识形态扭曲和权力话语毋庸多言，作者将其概括为“仇外的他者指涉模式”；而后者却在普世性政治行为法则的归纳总结中，走向了以西方预设过滤他者文化语言的死胡同。政治上的仇恨与文化上的傲慢，使得区域研究长期以来呈现高度政治化的霸权色彩。在此种情况下，李国栋借德里达的“友爱的政治学”来印证斯皮瓦克对于“新比较文学”学科“去政治化”的观点：只有努力去实践“不可公度的友爱”，去营造跨文化的、“再也不会排斥任何人的博爱”³，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实践才能产生。也只有在这样的政治实践下，“新比较文学”才能“主动地去接纳他者、他异性，乃至敌人……在全球化趋势无可避免的今天……跨越边界，拥抱他者，克服历史遗留的情感障碍。”⁴

而为了达成“拥抱世界”的“新比较文学”学科愿景，比较文学与区域研究必然要走向融合发展。作者指出，两个学科的融合首先有助于克服比较文学学科中根深蒂固的主体性问题。斯皮瓦克认为，旧的比较文学会刻意营造同一化的集体，再在不同集体间设置差异进行比较：“为了假设一种文化，我们必须先假设集体。”⁵而这种文化观念在区域研究中体现得同样显著，后殖民主义创始

¹ Gayatri C. Spivak (2003). *Death of a Disciplin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 Xii.

² 作者在这里指出，“新比较文学”并非是一种随意称呼。恰恰相反，这正是斯皮瓦克《一门学科之死》系列讲座的主题：The New Comparative Literature.

³ [法]雅克·德里达著（2006）：《〈友爱的政治学〉及其他》，胡继华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315。

⁴ 李国栋（2024）：《比较文学与区域研究：危机、挑战与整合》。重庆大学出版社：96。

⁵ Gayatri C. Spivak (2003). *Death of a Disciplin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7.

人爱德华·萨义德早在 1978 年就通过《东方主义》指出，“东方学”——也即对于中东地区的区域研究——充满对东方/西方两个二元对立集体的偏见，所谓“系统差异”“抽象概括”等形容每每见于东方学研究之中¹。由于后殖民主义在区域研究学科中的长期影响，对区域研究中粗暴集体性想象的反思与解构早已颇为成熟。因此，比较文学与区域研究的交汇有助于前者藉此反思自身，对盲目的集体想象与差异建构实现祛魅。

在比较文学和区域研究由于危机而需要走向革新和转型的关键时刻，同样面临着对学科转型后不确定性的巨大恐惧。对于比较文学而言，一方面，放弃西方中心主义就是放弃“西方-世界”的文化主导地位，整个西方文化长期以来倡导的普遍主义观念面临着合法性冲击；而在后殖民理论的指引下，区域研究在多中心主义的文化研究视野中尝试重新认识普遍与特殊，并使西方体验与了解原本的他者视角，促进多元文化间的交流互通，在很大程度上安抚了普遍主义崩溃后西方遭到的冲击。另一方面，比较文学固有的学科边界在这种解构主义的开放式转型中面临巨大的冲击：传统的文学性的边界在跨媒介文学生产、大众文化发展的潮流中摇摇欲坠。而区域研究恰恰可以弥补文学性边界失控带来的不确定性，将文学作为他者性呈现的媒介进行文本研究。有助于形成一个真正以文学为中心，却又能够广泛接纳其他文本研究模式的“超级学科。”

而如斯皮瓦克所言：“没有人文学科的支持，区域研究只能以跨越边界的名义侵略边界；没有经过改造的区域研究，比较文学会禁锢在自己的边界内，无法跨越出去。”²这两种学科的融合是相辅相成、相互“开启”的。对于区域研究而言，比较文学的介入也具有重要的推进性意义。在早期的异质性视野（东方学的研究）与中期的仇恨性视野（苏联学的研究）接连受挫之时，其学科主动权已然被后殖民理论所攫取，与其说如今的区域研究是在对区域展开研究，倒不如说是在反思对区域的研究中有哪些潜在的意识形态、文化霸权、殖民主义问题。文学作品能有效地打破东方主义的固定模式，或多或少的直接言说鲜活的现实，比较文学研究的参与可以为前者提供一个新的抓手，将文本与文化作为新的区域研究中心，重整旗鼓进行学科转型；其次，比较区域研究的兴起使得比较文学与区域研究之间的学科邻近性进一步拉近，两门学科之间的方法论逐渐重合，现代文化转向的趋势更是使得“比较区域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共同走向“跨文化研究”的范式，这就为两个学科的整合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此外，在斯皮瓦克对于异文化再现合法性的否定中，区域研究专家“进入他者”的权力也随之被剥夺，被判定为缺乏实践价值、扭曲是非的“认知暴力”，失去了对主体国家对知识价值，又招致他者文化的抗议与抵制。在这一情况下，比较文学的文本、文化及翻译研究成为一种新的抵达异质性他者文化的可能之路，有助于区域研究学科走出后殖民主义批判的泥淖。

综上所述，作者以斯皮瓦克的“新比较文学”学科理念为起点，对“比较文学”与“区域研究”两门传统学科的革新、融合与互补的可能性进行了阐发与梳理，认为欧美比较研究的成熟，在整体上成为区域研究转向的契机，正如斯皮瓦克指出的：“有了被区域研究增补的比较文学的支持，假设的集体就跨越了边界，这时，人们也许会试图把他们自己理解为一——想象为一——行星的。”³因此，

¹ [美]爱德华·W·萨义德(1999):《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385。

² Gayatri C. Spivak (2003). *Death of a Disciplin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7.

³ Gayatri C. Spivak (2003) *Death of a Disciplin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72.

只有打破二者陈旧的学科观念，主动放弃失效或过时的研究方法，并通过跨学科互鉴生产出新的研究范式，方能以更为鲜活的生命能量真正迫使当今的比较文学与区域研究真正转化为开放性、包容性的新生学科，突破原有的桎梏，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与特点。

三、“新比较文学”的行星主义学科愿景

作者以缜密的推理论证就斯皮瓦克的学科改造方案展开了详细的阐述，认为斯皮瓦克的构想将比较文学的细读优势、批判优势与区域研究的语言优势、跨学科优势结合起来，使得两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具有“行星性”的新学科。在这一蓝图中，危机得到化解，中心得到分散，他者得到解放，意识形态得到稀释，诸多当下我们习以为常的问题得到暴露与反思。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文化研究的反思。自伯明翰学派以来，文化研究在比较文学学科研究中如日中天，但这一研究范式在带来新视角、新方法的同时，其内部也有许多被忽略的问题。作者指出，自文化研究诞生以来，政治批判与干预色彩就如影随形，且文化研究整体而言，是完全自西方内部兴起的知识话语，其批判策略往往忽视非西方的异质性他者声音。因此，文化研究“具有一种输出性的政治欲望与意识形态倾向”¹。斯皮瓦克也指出，比较文学中的文化研究一方面继承了“伯明翰模式”的问题，在政治认同和经典化秩序上，试图呈现一种政治正确姿态却流于浅表，只是“在米字旗上加点黑色，或是重新解释一下美国黑人民权领袖杰西·杰克逊的口号，然后把彩虹中红、白、蓝色也喷到旗帜上去”²，只在西方范围之内思考种族文化与多元性问题，却延续了对非西方的属民文化的忽视，甚至强化了隐匿的压制；另一方面又常常以明显的先决性结论去批判区域研究的政治化问题，用一种主观立场去攻击另一种主观立场，常常把好的研究范式一同否定。因此，作者指出，“新比较文学”的学科只有破除对文化研究范式的盲目使用，才能打破“有限渗透性”的局限，在世界范围内取得新的可能性。

其次，在研究对象上，本书试图打破固有的西方凝视他者的研究结构，倡导“新比较文学”学科研究结构的“南半球转向”。这一概念最早由斯皮瓦克提出，她提出要以语言为基础，把南半球的语言看作活跃的文化媒介展开比较文学研究。周蕾认为，西方传统的比较研究中，遵循一种“欧洲和它的他者”的阶序结构³。欧洲作为北半球的中心，代表了一种文明的最高水平，使得文化资本与智识劳动的配置以欧美为中心不对称分配，越接近欧美、与欧美发展相关性越强，则研究越多；而在地理上远离欧美、在政治经济上影响力又较为稀薄的南半球国家，就完全成了一种同质化的他者——最典型的案例就是“黑非洲”的同质化与他者化。尽管对于南半球的研究目前仍在语言问题上受到极大限制，但仍然是“新比较文学”学科建设重要的地缘发展方向，“将研究对象转向南半球会导致以西方为时空中心的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变，这种转变必然会重构比较文学与区域研究的学科话语”⁴。南半球转向意味着西方的他者不再是对西方的逻辑补充，而是两个平等的主体之间的对话与交流；而西方投向研究对象的他者凝视模式，也将转向“全世界覆盖”的学科愿景。唯此，“新比较文学”才有可能走向“行星主义”的未来。

在“去文化研究化”与“南半球转向”的论述基础上，李国栋指出，斯皮瓦克所倡导的“新比较文学”根本基础在于比较文学学科的“行星主义”化。“行星/行星性”是与“全球/全球化”相

¹ 李国栋（2024）：《比较文学与区域研究：危机、挑战与整合》。重庆大学出版社：156-158。

² Gayatri C. Spivak (2003) *Death of a Disciplin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9.

³ [美]周蕾著（2011）：《世界标靶的时代：战争、理论与比较研究中的自由指涉》，陈衍秀译。麦田出版社：162。

⁴ 李国栋（2024）：《比较文学与区域研究：危机、挑战与整合》。重庆大学出版社：165。

对立的观念，后者是一种对西方扩张、覆盖全球的动态描述，是对同一性地球想象的控制论图景；而“行星”则指向作为“绝对他者”的地球，认为“行星”只是我们“借居”之所，是“想象他者异质性形象的方式”¹，只有在“绝对他者”的行星面前，“我们”才能是包括全体的“行星主体”，而不是某种新的二元关系中的“我们-他们”。艾米·J·艾利亚斯与克里斯蒂安·莫拉鲁将“行星话语”描述为“一种新的意识结构，一种具有文化剧烈扩张的、行星性特征的、地缘主题学的方法性接受能力。”²在“新比较文学”的学科愿景中，这种既包容异质性主体，又不对主体进行化约的新理念，在韦勒克“全球文学史”的观念上更进一步，真正消解了旧比较文学中不可避免的“主体-他者”的意识形态结构，使得比较文学的两端成为互为异质性主体的两个对象，建立起一种放弃冲突或权力竞争的平等对话关系。斯皮瓦克倡导将目光从内部的移民群体转向长期被忽略的少数民族族裔，并打破传统地缘政治格局主导的研究结构，细分研究区域，挖掘异质性他者。这为“新比较文学”打破“全球化”神话中的欧洲起源神话，重建以行星化的诗学解读为核心的异质阅读范式提供了指导策略。在这种全新的异质关系下，传统比较文学研究中熟悉的权力话语被转化为“诡秘”（uncanny）的认知体验，“新比较文学”的基本价值就在于克服剥除了意识形态权力结构之后的陌生感，理解“行星主义”视角下从认知暴力中解脱的陌生他者形象原本的复杂文化心理和异质性体验，从而打破民族主义的局限，回归“人类昔日的共同家园”。

结语

在当今政治文化状况与技术革新的背景下，本书细致梳理了前代比较文学学者的理论、愿景与观点，从“新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研究观念、方法论融合等各个方面对于这一融合学科的未来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与展望。本书以两种新兴学科的融合为基础，展开对一种面向未来、面向行星主义的“新比较文学”的展望，延续了艾田伯、巴斯奈特、米勒及斯皮瓦克以来对比较文学跨学科发展和视阈融合的诸多思考，以敏锐的洞见与缜密的论述解析了比较文学学科发展时至今日遇到的危机与挑战，并在突破学科界限的前提下，从学科交融的角度为“新比较文学”这一“未来学科”的革新与发展找到了一条可行的路径。该书文献扎实、思辨深入、视角多维，体现出作者在撰写过程中的深思与洞见。当然，对整个“新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发展与实现的研究不可能尽于一书。作者论述的重点仍然主要聚焦于学科理论与理论史的考辨，而在学科发展的具体实践，尤其是在“新比较文学”学科中国化等具体问题上仍未尽意。在跨学科思维日益盛行、学科融合日益深入、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今社会，“新比较文学”这一颇具发展潜力的学科构想该如何真正建构成型？它将如何对整个比较文学与区域研究的传统研究方法进行系统性革新？这一新变对于当今中国、对于当今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借鉴和启示？这些问题远非一书一论中可以解决，需要学界同仁在未来继续交流探讨，最终使这一蕴含诸多可能性的去中心化学科愿景得以落地；届时，“新比较文学”也就能够真正在现实意义上成为一门崭新的“未来学科”。

¹ Gayatri C. Spivak (2012) "Imperative to Re-Imagine The Planet." in *An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348-349.

² Amy J. Elias, Christian Moraru (Eds.) (2025), *The Planetary Turn: Relationality And Geoaesthe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xi.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Wang Shaokang ^{ID} <https://orcid.org/0009-0008-4339-6320>

References

- Amy J. Elias, Christian Moraru (Eds.) (2015). *The Planetary Turn: Relationality And Geoaesthe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Gayatri C. Spivak (2012). *An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ayatri C. Spivak (2003). *Death of a Disciplin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爱德华·W·萨义德（1999）：《东方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Edward W. Said (1999). *Orientalism*. Sdx Joint Publishing.]
- 李国栋（2024）：《比较文学与区域研究：危机、挑战与整合》。重庆大学出版社。
- [Li Guodong (2024).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Area Studies: Crises, Challenges, And Integ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 苏珊·巴斯奈特（2015）：《比较文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 [Susan Bassnett (2015). *Comperative Literature: A Critical Introduxtion*.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希利斯·米勒（2016）：《萌在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南京大学出版社。
- [J. Hillis Miller (2016). *An Innocent Abroad: Lectures in China*.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 雅克·德里达（2006）：《〈友爱的政治学〉及其他》。吉林人民出版社。
- [Jacques Derrida (2006). *Politics of Friendship*.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周蕾（2011）：《世界标靶的时代：战争、理论与比较研究中的自由指涉》。麦田出版社。
- [Zhou Lei (2011). *The Age of the World Target: Self-Referentiality in War, Theory, And Comparative Work*. Rainbow Book House.]